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三十期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编者的话：人们很想听一个活在过去的人讲解现今之事，比如人们很想知道纪念馆里的毛会如何评价今天。可惜，唯物论者毛不可能死而复生，尽管当今的毛左们经常表演阴魂附体，装神弄鬼。

但张春桥不同，他的《家书》真正令人产生穿越之感。我们看他的文字，就能联想到文革中那些大块文章，那些文章经毛修改同意，登在两报一刊的头版上，便传达出了毛的最高指示。

张的家书可以看作是那些大批判文章的继续。同样的立论，同样的感情，同样的逻辑——你只要承认他的前提，就不得不承认他的结论。

张春桥不但是毛的信徒，也是毛思想的制造者和阐释者。概而言之，毛思想分为两段，一段为新民主革命，一段为继续革命。如果说陈伯达们主要参与创造了前者，张春桥们则主要参与了后者。而后者，用辩证法的行话讲，是对前者的“扬弃”：文革继承了整风（对比两个“文艺座谈会”），彻头彻尾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文革中叫“资反路线”）。

毛思想是在对内和对外的权力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笔杆子们不但要为这种殊死的权力斗争提供大道理，也直接罗织和构陷外在的敌人和内在的对手。刀笔杀人于无形，丝毫不亚于枪杆子。

继续革命的具体对象是延安整风时毛所倚重的刘少奇，和毛主导建立的官僚系统。从这个方面而言，毛是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张春桥则没有这方面的纠结与困惑，他似乎更单纯而彻底。

读张春桥家书，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毛致江青信中的话：“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以及那句不祥的咒语：“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家书》通篇仍回响着这样的主调。

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并不如毛所料，而张对此的解释犹如失势时的托洛茨基，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认为历史的跨度与人的短促的生命不

可同日而语。但是革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给他女儿的信中，他说他虽然不知道，但相信“一定会发生”，并且祝愿女儿“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五十年，与已故唐德刚先生“历史三峡说”的预期大致吻合，指向却是南辕北辙。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张在给亲人写信时很放松，家国天下无所不谈。一方面，他已经停留在那个时期，拒绝前行，且不肯与现实妥协。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时时处在生活的激流中。但他丝毫不觉困扰，挥起阶级的快刀斩断事变的乱麻，削现实之足适观念之履。看他月旦臧否，游刃有余，却也令人心存疑惑：是不是太容易了一些？总觉得他在一盘围棋对弈中下五子棋，自己却未觉察，因为棋盘和棋子都一样。

对此的解释，西人恩斯特·盖尔纳有“邮址误投”之说。其大意是，马克思的救世福音原本是寄给阶级的，结果收到信的却是民族国家。张的问题在于，他坚持认为邮址没有误投。但却不知在后工业社会，那个“收到信的人”，那个“革命的领导阶级”究竟在哪儿。

希特勒的信徒戈培尔为其信念殉葬，毛的信徒张春桥却苟活于世，眼睁睁地看着历史背他而去。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本期内容摘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

《张春桥狱中家书》（摘录）

1985 年 7 月 21 日

维维、毛弟：

……从信里知道你们的一些情况。我常常想，这些年，你们的日子过得够艰苦了。这也许是幸事。苦难这东西，是可以把某些人压倒的，但更多地是把人们压得更结实。毛弟信中说，“自学出好成绩来非常不易。”这句话，十年前毛弟是说不出来的。现在，懂得了，就是好事。如果从此下决心干这件非常不易的事，结果总会比较好的。我希望，困难会使你们得到锻炼。学会一些真本事，为人民服务。希望也可能就在这些不被承认学历的、没有学历的人身上。中国历史上，有状元学位的人，真正有出息的，没有几个。……

1985 年 12 月 24 日

维维：

这封信，快一点，新年可以收到；慢一点，你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收到，也就弥补了去年留下的遗憾，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过生日这件事，我是越来越容易忘记。我自己的，你们的，都一样。到[倒]是在这天以前或以后会想起来。大半是联想起来的。头几天，看报上的消息，说起石家庄的几个地名，就联想到躲飞机，又联想到你那时穿着一件红小褂在防空壕里跑。从这里就想到，维维真是在炸弹声中度过童年的。还没有生下来，在张家口就挨蒋介石的炸弹；到石家庄，又挨炸弹；直到上海，1950年2月6日，又挨炸弹。感谢斯大林，是米格15把美蒋飞机打下来以后，上海才恢复生产的。老工人大概还会记得，“2·6轰炸”后上海真叫困难极了。也许是这样的环境，使你比较容易吃苦，不叫苦。你在五十一中的时候，是连吃饱饭都难以做到的，你也没有叫苦。有一个时期，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都受到批判，真叫人莫名其妙。现在又说“清茶一杯”之类的话了，倒也有趣。过去，连清茶一杯也没有，都是白开水呀，要喝茶，自己付钱。其实，许多事，和老百姓无关。有关的，如物价，我看到几篇文章，真是越读越糊涂。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菜还是那几种菜，几年一贯制，“能有菜吃，还不满足嘛，何必吃螃蟹？”真有意思。从报上知道，螃蟹要三十元一斤，我也不怕你吃了过敏了。这里，香蕉据说要一元多一斤，很难买到。大概是控制住了，报纸、广播谈物价的少了。北京是出苹果的地方，我还能吃到。可惜，在你生日的时候，我也不能送你一点北京苹果。……

1986年2月2日

维维、毛弟：

……毛弟说的学习为了考试、为了文凭，这是事实。我耐着心听了两门大学课程，对当前的教学情况有一点感性知识。授课是填鸭式，辅导课更明确，就是要学生记住某一点、某一点，考试就考这些。我看这一套是很难改的，因为老师们以及老师的老师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知道，毛弟还要考几门课才算毕业？我还想知道，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待遇，差别在哪里？不急，有空时，告诉我，没有时间就慢慢来。既然考试、文凭成了谋生的手段，我不反对你用些时间办完这些事。靠记忆记住一些知识，有时也有用处，不会都是废物。虽然听广播说，有一位洋大人宣称另一位洋大人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过时了。我以为，你们如果有时间，还是要独立地思索一些问题，不然会被这些东来西往的奇谈怪论弄昏头的。维维说她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这很好。站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思索一些问题，是极其有益的。我佩服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有学位论文，有渊博的知识，而是总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观察问题。……

1987年8月2日

维维：

……“七七”50周年，想到很多事。这个月，“8·13”也是50周年。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的事，中国兵在北站附近布防，日本兵在北四川路耀武扬威，仍然在我眼前。而这些事，对你来说，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事了，就像你记得的往事，对○○（大外孙）来说，也难以有同感一样。这是无法避免的。有些事，讲也用处不大，还是要事实来教育人。五十年前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五十年后又会怎样呢？我是看不到了，希望你能看到，○○（大外孙）他们当然会看到的，那时，总不至于还是帝国主义称霸的天下吧。也许某个国家代替美苏称霸，但是，他们总归要灭亡的。

你的身体还是要当心。既然还有药吃，就吃吧。劳保、公费医疗，历来是增产节约的对象。再就是节水、节电，而且都是要老百姓节约一滴水、一度电。还宣传日本松下公司如何节约每一个信封，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自己与松下有什么区别，很难说了。

孩子们的事，是应当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在过去，都是靠组织，现在不叫靠了，做父母的就不能不多关心一些。○○（大外孙）的年纪，已经有自己的头脑了。小学五六年级，我在开封，已经独自一人去宋故宫、铁塔这些地方玩了。很可惜，他不可能碰到大串连，到外地跑跑。有机会，他还是可以到农村、小厂去看看，多知道一些实际情况。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就是看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几条马路，就以为了解中国了，不是很可笑吗。……

1988年2月7日

维维：

上月二十一日收到你和文静十三日写的信。

今天星期天，没有什么事。算一算日子，如果没有意外，今天写信，春节可能到你们手里，于是就要来纸笔，开始写。

我的印象中，每逢春节，你们姐妹总是要见面的。这封信，也就是为了向你们大家祝贺春节。

我记不起：在上海的这些年，有哪年春节过得很满意？刚才听了北京台的一段《家庭教育节目》，说是这几年“压岁钱”越来越重，每个孩子收入上百元，多的上万元。我回想你们大概一次也没得到过。我小时候，还有压岁钱，都是圆形方孔的“制钱”，可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新生事物”，不少都是这类老古董。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是不是也

要为此增加一些负担？电台播出的孩子们的录音，有的说大人没钱也要想法给他们。过节成为负担，不然电台也不会几次讲这个问题。这类事，一旦成为风气，就不容易改变了。

放鞭炮，是另一个“热门”话题。我倒希望你们少放一点，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孩子们的眼睛、耳朵。○○（二外孙）的新衣服被炮火轰得斑斑点点，那还算小事。

也许今年春节稍微冷清一点。据说，北京烟火炮竹进货比去年少 30%，即三百万元，污染程度也差不到那[哪]去。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你们春节过得愉快，能够休息休息。

我这里的春节，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论什么节，我都希望快一点过去。只要过节，就要放假；一放假，就要调整值班人员，开饭时间就变来变去，春节假期长，乱的时间就更长。这一部分人的休息，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休息为代价的。中国人的“团圆”观念，近来不是越来越淡漠，而是越来越浓了。我的印象中，日本人的家庭观念也是很浓的，但是他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面向世界”。抗日战争前，日本人的双脚伸到中国的穷乡僻壤；现在，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日本佬的面孔到处可见，甚至中国人也被看作日本人。可是，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就是“家乡的小河”、“家乡的大河”，好像唯恐中国人改了“热土难离”的观念，真奇怪！当然，也有例外。我看到一条消息，杨永桔在巴黎以一个中文报社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还有一个劳远[元]一，以中国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言（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他的父亲是外交部的，我三十年代的朋友），这算是你们这一代走向世界的人物了。世界是多么复杂。

真是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运动会出现新变化的。

1988 年 12 月 17 日

维维：

……我并没有特别奇怪你为什么长时间没有来信。一是知道你们忙，二是上海的来信不算少，你们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为搬家竟自费了这么多的周折。办事难，我也知道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报刊上流行的说法是新旧体制的冲突，我看是七巧板的设计，同实际情况不符。原来以为从日本拿一块，从美国借一块，再从西欧、东欧租几块，加上自己原有的“好传统”或“坏传统”，就可以造成颇具特色的七巧板，谁知板有了，拼凑来拼凑去就是不成型。他们不是总结实际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一会儿向这位教授请教，一会又向另一位总裁作揖。搞来搞去，就越来越复杂了，冲突也就无法平息。有什么办法使“赤字有益论”和“三大平衡论”不冲突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确实难办。你的搬家，不过是

一个例子。你“忍无可忍”，那一位副教授也会讲“忍无可忍”的。我想，现在社会上牢骚盛行，又无法解决，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想了这些，我的心情最近还算平静。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会使广大人民受到教育，学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中等华人、底层华人，都有困难。我是不相信那些高等华人会理解这些事的，虽然他们天天歌唱“洒向人间都是爱”，却又天天咒骂中国人愚昧、野蛮、封闭、懒惰。甚至一浪又一浪地呼喊要向日本学习上下一心，云云。真不知道这里面有百分之几的真理。以前说《人民日报》是公共论事，谁都可以上。现在恐怕是谁有权，谁有钱才能上。看电视，我就想，这究竟是谁家办的？好像是谁出的广告费多，算谁家的。连那些非广告节目，也是由广告主作主的。欧洲人说，他们是用日本电视机看美国节目，中国人该说什么呢？……

1989年6月1日

维维：

……信里说到○○（大外孙）的情况，很有趣。我好像没有接触过这类孩子。他正是多变的年纪。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对〔最〕难估量，有人说很大，有人说很小。不管怎么说，对他们的品德还是应当关心。这确实不容易。我到他这个年纪，就自作主张了。不过，我当时武侠小说，甚至《红楼》、《水浒》都不看。学校离省立图书馆很近，下课后就进图书馆，看报，看新到的杂志，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那几年，我确看了相当多的东西。我想，你还是可以做点引导工作，引导他看点好书，关心一点人民的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分析分析武侠小说。我是解放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才看了《三侠武〔五〕义》之类的书，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帮助孩子懂得这些书，是很难的。整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风气，不大容易改。但是，如果加以引导，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惜，现在没有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中一些青年带路人了。当然，我也不悲观，我发现有些人在认真地思考，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孩子们也可能在这种反复中学会识别方向。我只是希望你能帮一帮○○（大外孙）。他不是喜欢历史吗？从这里可以启发他吗？“办公司”做生意也不坏，其实他也不懂。医生，恐怕不见得吸引住他。这些都只能由他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兴趣来定。我父亲也要我学医，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后改为从事文艺，这使我热心文艺，而后来，我又放弃了文艺。你看，路是很曲折的……

1989年12月16日

维维、毛弟：

……其次，我确实已经控制住自己，不再多想那些事。想也在想，不多想。具体情况了解得太少。头些时候，捷克电视剧《公务员》，看了一个片段，感觉到那就是为闹事作舆论准备的。看那些党政机关的形象，群众不闹事才怪呢。何况东欧国家对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早已闹了多年。你想，如果中国领土上驻扎着几十万外国军队，中国人会高兴吗？

除了方励之、刘晓波一类买办资产阶级，恐怕很难找到拥护外国军队长期占领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领导权落在了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手里。不过，我仍然那样想：我们自己要解放台湾，过去支持南北越统一，今天支持南北朝统一，为什么不敢坚持东西德统一呢？美帝国主义面前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想制服它，也就难了。苏修更会是怕得很。因此，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被打破，可能是一件好事。贡献出马克思列宁这样的思想家的德、俄两国，很可能再贡献出一位无产阶级思想家。诸如此类，无边无际的〔地〕想一想，心里也就不“愁”了。

你们可以放心：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几十年的风浪把我锻炼得可以应付它们了。虽然有时也还会激动，但是，可以很快冷静下来。

回想起来，自从 1970 年庐山会议，对陈伯达拍过一次桌子，二十年来，再也没有这样干过。同样，我也相信你们，经过这些年来的熬煎，再大的困难也不会压倒你们了。上次信上的一些话，并不是别的，只是对人民群众的处境，表示一点关心。

毛弟信上说到提倡国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条重要纲领。起过动员群众的作用。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那些资本家的衣食住行都是崇尚洋货的。北京已经办了一个“国货精品”大楼。

几年来，《人民日报》上从大楼奠基就吹，头几天，正式开张，颇有几位老爷太太前往祝贺。后来，细看广告文字，才知道所谓“国货”已经变成“跨国”，港、澳、台的“国货”也包括在内，好像港澳台已经统一了。这是应当祝贺的。一提倡国货，连什么过渡、什么特区都不存在了。毛弟不必为提倡国货不解，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你会发现很多笑话的。言行不一，是常见病。可惜报纸上都是批评老百姓，以及所谓“民族劣根性”，前者是把板子打在老百姓屁股上，后者是整个民族都要挨打。崇洋也好，媚外也好，都是大人物带的头，至少是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工人群众中的问题，我是向来不怪工人的，如果没有问题，那才奇怪。头几年，几乎雷锋、好八连都洋化了，难道也怪这些连队吗？不说了，这方面你们比我见到的多。

……确实，八十年代就要结束了。再过十年，○○（大外孙）都二十多岁了，依次○○（二外孙）、○○（三外孙）、○○（孙女）都长大了。昨天看《人民日报》，一篇纪念张奚若的文章，又吹他批评毛“好大喜功、急

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甚为得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迷信未来：○○（大外孙）这一代会开辟出前进道路的。

愿他们健康成长，愿你们在新的十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1990年5月12日

小徐、小妹：

你们好！我们确实多年未见了。记得，最后见小妹，是一九七二年。从那以后，我没有回上海，你们也没有来北京。

只从上海的来人来信中知道你们一些消息。五月十日收到你们五月二日信，这是头一次直接得到你们的信息。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

我的身体还好。按我的年龄和生活环境来说，还算不坏。我头脑还清醒，精神也还好。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精神的力量是极其宝贵的。

你们的身体怎样？听说小妹身体不算好，近来如何？我挂念你们的身体，更关心你们的学习。记得小妹从部队给我写过一封谈学习的信，我也回了一封信。时间过了十多年，不知道近来学习情况如何？这些年的变化太曲折、太大了，每天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认真读点马列，是会如在五里雾中，不知向哪里走。或者如同流行歌曲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是一定要走错路的。你们都是工人，都是当了二十年的军人和工人的人，这种地位可以使你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容易接受马列，但是不会自发地懂得马列。生活很劳累，又有家务，自学也不容易，但是不学习又怎么办呢？你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长大的，应当像他说的那样，挤点时间，看点书。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过去看不懂的，现在可能看懂了；过去只从字面上了解的，现在可以从深层上了解了。不要被马列难读之类吓着，马列的书是为工人写的，你们不妨试试看。也许你们已经读了一些，那就再前进一步吧。……

1990年7月27日

维维：

……我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上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情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

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好在，现在许多人眼睛睁开了，虽然人数不多，真正的希望是在这里。……

1991年2月18日

小妹：

……当今世界上，靠“自我”的似乎越来越多。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1991年4月22日

○○（大外孙）：

你好！

五月八日是你十六岁生日，祝你快乐！

在北京，我们谈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你读过《八连颂》吧？有一位大人物很喜欢念诵其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另一位大人物到好八连视察，指着墙上的《八连颂》说：“最后两句最重要。”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看至少不完全。《颂》一开头就问“为什么？”答曰：“意志坚。”坚在哪里？“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是非常明白，不该误解的。其中，“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为人民，几十年”，哪有军民团结如一人？世界上“意志坚”的人不少，蒋介石反动到死，能说意志不坚吗？但他是反

人民的。越坚越反动。昨天听广播，又在吹嘘丰田、松下如何节俭，赞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付小账一分也不多给。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不多给？他说，因为这样我才成为富翁，才不落到你的地位！现在中国的宣传工具就是掌握在这些昏头昏脑的人手里。他们分不清为人民，还是反人民！是为剥削阶级还是为被剥削阶级！分不清这个根本事实，也就不可能理解《八连颂》和世界上的人和事。

只有为人民，才能做到那八个“不怕”。“不怕帝，不怕贼”，只有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做到，卖国贼没有不怕帝国主义的。

你的生日很好记：过了“五四”就是。因此，希望你读一读毛主席纪念“五四”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那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说这是区别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也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个首先是，不仅是文艺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没有阶级观点，就不可能理解苏联、东欧的变化，就不可能总结那里发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工作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中国的国情。“分析好，太有益”，只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导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鲁迅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对国情作了分析以后，对敌人、对人民采取的不同态度。

十六岁了。再过两年就要进入青年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遇到的曲折也许比这十六年还要多。但是，困难固然给人带来苦恼，也会使人得到锻炼。你现在还是个“孺子”，希望你健康地成长起来，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孺子牛”。……

1991年5月25日

维维：

上个月没有给你写信，心里仍然有些话要说。

你上次来信，给我的印象是：心情不愉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临近“七一”，使我回想起20年前的一件事。你还记得我寄给你一篇纪念“七一”五十周年的文章吗？那篇文章我写得极不痛快。庐山会议林彪

发动政变未遂，事情并没解决，因而文章很难写。写出来一个初稿，印发中央会议讨论，人们却热衷于争取在文中提到与他（有）关的事，其余的一言不发。整个会议本来应当是批陈伯达的，兴趣却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他们明明知道这并不是陈伯达的事，却在批陈的名义下干得十分热心。实际上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写好文章呢？只好不痛不痒。聪明的周恩来见我一句也没称颂林彪，就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语录”

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稳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寄给你一份清样，并且要你在五十年以后，党的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看看那时的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是想说，再过五十年，中国应当变得更加光明。十年、廿年、一百年，在历史都是很短暂的。当时，我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没想到，当时林彪已在策划新的政变，更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林彪就摔死了。现在，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反动派的猖狂，可能使革命遇到挫折，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新的革命高潮总会到来的。……

1991年5月25日

小妹：

……工厂的问题，不是今年的新问题。这是多年来的政策造成的。所谓搞活大中企业问题，不是指三资和私营企业，而是指国营大中企业。这里讲国营或全民企业，实际上也不是原来的国有国营，而是国有、承包经营。这些年的政策是对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优惠再优惠，“环境”改善再改善，对原来的大中企业却卡得很死，处在外资、私资的包围之中，无路可走。出路何在？从根上看，上海的办法是赵紫阳吹嘘很久的“嫁接”，就是要原来的国营企业，同外资、同乡镇企业搞联营。这个办法，也不见得行得通，外国资本家也不会对中国发慈悲。而且，这种“嫁接”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性质。连经济界的一位大官叫吕东的也说：“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将会影响工业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些问题，你们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看一看了。不过也不要太悲观。当人们看清楚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办法也就来了。

五一节那几天，我问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五一节是怎样来的？为什么纪念五一？而这些人，说起歌星、球星来，那就十分熟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危险就在于：人们的政治冷淡主义已经很普遍。这正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并且为公开地“和平演变”到东欧、苏联那样准备条件。前天，23日晚，我看了一场电视直播的文艺晚会，名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49周年”，演出的节目却几乎全部是《讲话》以前的老古董。这究竟是想说明他们拥护《讲话》呢，还是反对《讲话》呢？只有天知道了。

○○（二外孙）又到期末考试了吧？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总觉得他身子比较单薄，不要被功课压垮了。有些人，对帝国主义怕得要死，对整学生却

很有办法。说了多年要减轻学生负担，实际上越来越重。上海在推行中学会考，这是国民党推行多年，遭到广大师生反对的办法，现在又当宝贝拾起来了。希望你们不要对孩子施加压力。当然，功课还是应当做好的。……

1991年10月11日

○○（二外孙）：

你好！你和你妈妈九月二十二日的信，二十八日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的身体近来还好，同你们上次来时差不多。

从来信看，你们的身体都不算好，这是应该十分当心的。○○（二外孙），你喜欢体育锻炼吗？适当的活动，比吃药还管用，希望你在这方面加把劲。

真没想到，你对养鱼这么有兴趣，积累了这么多知识。热带鱼，我见过，没养过。所以，你说的那些鱼名，对我来说，都算新知识。可见，实践出真知。知道的多了，再用脑子想一想，找到恰当话表达出来，就是文章了。你不是想知道怎样写文章吗？就是这样写。你不是写出了养鱼的一番话吗？我就写不出，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当然要写出好文章，还得多加把力。

听说你很会安排生活。又要学习，又要长身体，自己要注意调理好，叫大人放心。

上次是给你妈妈写信，没给你回信，这次给你写，不给她写了，公平吧？

1992年1月21日

小妹、小徐：

你们好！11日的信，17日收到了。

……信中提到人们对苏联解体不理解。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有欢欣鼓舞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先高兴后忧虑的。我们不必跟着别人跑，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而应当看本质。早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党就指出：赫集团的上台，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不是乱戴帽子，而是事实。是他们自己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名称。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我还记得，在人大大会堂的国宴上，每当我们一讲“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苏联大使及其追随者就慌忙从餐桌上站起来，边吃边退

场的狼狈相。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六世的角色，全面地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罢了。据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小知识分子，一旦失业那就更惨了。苏联人民上了当，受了骗。我觉得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1992年4月22日

○○（大外孙）：

一年多不见了，你好吗？五月六日是你的生日，这封信把我最好的祝愿带给你，希望你生日愉快，健康成长。

从你的生日，联想到许多事。听一个人说过，他小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最有兴趣的是书里说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描写点心、宴会的那些章节，吸引着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再读，兴趣就转到人物和事件，对贾府的人和事就有喜有怒，有爱有恨了。再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其中描写的是封建贵族的兴衰，才懂得对其中的人物要作阶级分析。这个人说的是他对这本书的认识，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一步比一步深入的历史。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代表性的。当然，也不能代表一切人。比如，北京有个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来今雨轩”饭馆，近年经专家精心研究，出台了“红楼宴”，专门出售《红楼梦》里的饭食。出这个主意的就不是少年人，而是比我岁数还大的清朝的遗老遗少。可见，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仍然站在老地方未动，依然做着他的“红楼梦”。北京新造的大观园，更是号召人们重温元妃省亲的旧梦。可见，人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少长而区分爱憎的。电台经常播放“爱的奉献”这首歌，（“正大综艺”另有一首），演员也很卖力，可是，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把爱奉献给一切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用号召“拿出一点爱”，布什就爱美国亿万富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而绝不会“拿出一点爱”给近在咫尺的卡斯特罗，要是他真的爱起卡斯特罗来，美国的亿万富翁就不爱他、就要把他赶下台了。这个道理，听来简单，懂得并不容易，变成自觉的行动更不容易。在现代，至少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弄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你现在还看武侠小说吗？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看一切武侠小说，问题在于这些书的内容，包括那些爱国大侠的内容，都是脱离实际的，很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他们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有根本区别。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不只是某个地主、资本家，某个洋鬼子。那些最了不起的武侠、文侠，都谈不上消灭封建制度，更谈不上消灭资

本主义制度。他们都是个人行动，或者哥儿们义气，而不可能形成像工人阶级这样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去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最后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寄生虫。不要说某个侠客，就是今天，用个人恐怖行动，也消灭不了资本主义。当然，要弄懂这些道理，不是这封信能办到的。你是个聪明孩子，只要肯用功，读点有关的书，总是可以弄懂的。

你很快就要进入青年时期了，再一次祝愿你健康成长。

1992年11月22日

小妹：

……你还记得石家庄吗？我们在石家（庄）的时候，还是个十七、八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已经超过百万了。我最后一次到那里，还是1950年去看你那次。当时你住在奶娘家，她们家很穷，靠卖青菜为生。我去的时候，你当然不认识我了，也不要我抱，直到对我的眼镜、钢笔发生兴趣，才和我亲热起来。这些事，恐怕你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怎么会专程去看你呢？一来是把你放在那里不放心，二来是范长江给了我一次机会。这你就更不会知道了。范当时主持中央新闻总署的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电话，说新闻总署要我到北京谈华东新闻学院的工作。这个所谓学院实际上就是接管下来的国民党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学习班，我是挂名院长，有什么事要谈？

到了北京，果然没事可谈，老熟人陪我逛了两天，范长江才约我到一家饭馆吃饭。先说对不起，这两天他忙于《人民日报》的事，中央要他去主持《人民日报》，连着开会。吃饭间，他拐弯抹角地说到新闻学院招收新生的事，当他听我说此院根本不招生，我只是挂名的情况，才恍然大悟地说：“是这样！”然后才问我《解放日报》上以我的名义的登的一则《启事》，我说这是恽逸群登的，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更是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一说到这里，你大概越看越不明白了。原来当时全国各地新闻界失业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范、恽的老朋友，纷纷求范、恽介绍到新闻学院，恽灵机一动，用我这个院长的名义登了一个《启事》，说包括范、恽的介绍信也无效。恽的这个举动，本来的用意是用我这盾牌为他们挡驾的，没想到一下子触怒了范大人，而范以为是我干的，才把我找到北京，客客气气地在饭桌上“问罪”。至此，真相大白，不问罪了，我也就趁这个机会，转道去看你了。

说起这件事，使我联想到你所说的很多工人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情。50年代是中国大变动时期。上面说的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它涉及很多人。范、恽都是三十年代就出了名的记者。你不是说有些人“头脑活”吗？这两个都是极“活”的人，他们在国民党地区极其活跃，却没有出事，就是证明。为一个启事，范明明一肚子火，却请我吃饭，不能不说他“活”。而恽逸群在上海滩上，出入于官场、舞厅，三教九流，也是本领高强的。这中间也使

他们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范请我吃的那顿饭，我总觉得不像共产党作风，所以，几十年后，我还能记得。恽可以不问我一声就用我的名义登报，更是超出常轨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1948年济南解放后，我和他通讯中曾说，我家在济南，如果有人到济南报社找我，请转告我在石家庄。不料他就在报上登了一个我的《寻人启事》，你三叔就是看了启事到石家庄把你们接到济南去的。恽的这种作风，导致了他第一次罢官：51年9月胜利日，毛泽东、斯大林互致节日贺电，《解放日报》却只登毛的。原来新闻稿中斯的电文送到报社时，总编辑下班走了。陈毅闻知，勃然大怒：“全世界共产党的报纸，只有《解放日报》没登，怎么得了！”（这句话的含义你可能不理解，可以问你妈妈）为争取主动，罢了恽的官！所以，即使范、恽这样“活”的人，在大变动中，也不容易“适应”。我讲这段故事，只是想说，在当前的大变动中，真正“适应”也不容易。

对于孩子，我听过不少广播，都是讲大人如何教育子女的。不能说全是废话，至少缺少一个基本点，就是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这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阿庆嫂、刁德一两个人都是极有本事的人，立场坚定，有勇有谋。但是他们在“为什么人”上，是根本对立的。正是有了这种对立，才产生出两种怎么为，才演出了一场场的智斗。如果说教育孩子，应当抓住的正是这一点。……

1992年12月20日

维维：

……一到岁尾，人们就要回首望一望。读你的信也使我想起许多事。这里不妨说一些。

记得你入党的时候，买来四卷《毛选》，让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写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知道毛泽东的名字，不知道毛泽东思想。你有幸在入党的时候读到《毛选》，希望你认真阅读，等等。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38年初的一个晚会上。后来，像很多延安人一样，能够有机会听他做报告。第一次谈话，却是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

第二次谈话，却是1958年了。相距将近20年，中间多次见到过，也知道他对我的某些文章的评论，却没有谈过话。58年初，正在开上海市党代表大会。正月初二，2突然要柯到杭州，并且指定要政治报告起草人一道来。在杭州刘庄，他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拿着的就是那份报告草稿。落坐以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支持我呵！”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奇怪：他怎么提出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当时，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

询问起我的家乡、工作，当得知我只是一名市委委员没有具体职务时，脱口说：“白衣尚书”，封了我一个“官”。接着开了几天的会。每天都能见到他，并且边吃饭边谈问题。大家的情绪很高，当总理报告决心 15 年内修好三峡大坝时，他扳着指头数：“80 岁！好，到时候去游泳！”

当然谁也没料到出现那么多的曲折，三峡至今还没有出平湖。从杭州回来，开市党代会。之后就是大跃进了。我是直到 10 月才外出看看。刚走到南京，就被叫到北京，从此，就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武汉，亲眼看到他怎样把狂热的空气压缩下来。我常常想，那些嘲笑大跃进的英雄好汉们，是根本不理解 1958 年的。顺便说一下，你们姐妹都见过毛主席，只有毛弟没见过，可是，他未出生就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了。就是那次杭州之行，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陈丕显指指我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此“一个”就是毛弟。

再过几天，又是他的生日了。想了想，我只同毛主席一起过过一次生日。那是 1966 年 12 月 25 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的时候，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谈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呵！”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谈，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了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是主观唯心论，他（陈伯达）认为是唯物论，我认为是客观唯心论，统一不起来。——在当时那样繁忙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恐怕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一起过生日。每年到这一天，总是由总理主持，在人大会议约政治局同志吃一碗面。最后一次，1975 年，我从柬埔寨回来，邓小平到机场接我，说“到大会堂聚一聚”。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人，把蒋从鬼变成人”，据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 100 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 1927 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

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的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们那里不是有工人很羡慕你见过毛主席吗？四十岁不能算老。我真正懂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是 40 岁以后。

不论别人怎样处置你，都要振作精神，做一些环境允许自己又有能力做的事。在漫长的革命征途，毛和他的战友们在“鬼也不上门”的日子里，都是力争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祝愿你在今后四十年里有更好的成绩。

你的信我能理解，也使我想了一些事。有些事还要再想一想，这封信就不多说了。

我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为我操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孩子，好好做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问○○（大外孙）好，祝他更好地完成高中作业。

下次写信就是 1993 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这将是平坦的一年，也将是锻炼人的一年。祝新年好，祝你生日快乐！

附录

张春桥与文静于 1965 年 1 月 1 日在送给维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扉页有如下寄语：

维儿，幸福的孩子，愿你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妈妈

1965 年元旦

1965 年 1 月 6 日，维儿满 18 周岁了。30 年前，我也 18 岁，可是，那时，我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尊敬他，却没有看到过他的一篇著作，也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后来，虽然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至今学得很不好。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爸爸

1965 年元旦

1993 年 1 月 10 日

维维：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并且说回过来看看鲁迅的书，懂了许多。你举了些例子，火车撞坏汽车，有人持刀杀人却无人过问，等等，于是问道：上海人是最自私吗？国民性又回到三十年代了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争论，头几年报刊上也不断地有议论，并且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殖民统治两百年才能改造过来这样的奇谈怪论，最近又有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改造国民性的高超理论。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除国民经济、国民教育这些包括全体国民的活动以外，一般不用国民这个词。孙中山喜欢用国民，蒋介石又继承了这些名称，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等，为了和蒋加以区别，也为了更科学，我们采用了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等等名称。有趣的是，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都把人民这个词抛弃了。

鲁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国民性的相当多，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从学医到学文，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说的国民性涉及很广，但是，据我看，他始终没有研究清楚。所以，你也难以看懂。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往往抓住鲁迅早期思想的弱点，加以发挥，攻击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愚昧无知，只配做亡国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而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死了多少中国国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和这些人不同。他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对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对人民是满腔热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鲁迅的作品是极生动、极重要的材料。他笔下的那些“国民”，正是当时的农民、小市民。他不是藐视他们，而是他自己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他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看不到阿 Q 们中间蕴藏着的力量。这也难怪，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阿 Q 参加的“恐怖活动”，农民的自发斗争即“不准革命”的革命不可能使鲁迅看到希望。他当时的思想武器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人类会进步，一代会比一代强，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这样冷酷的事实：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在内，同是青年，为什么这一些青年杀另一些青年呢？鲁迅在研究国民性的

过程中是极其痛苦的，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读鲁迅早期的作品，要了解他早期的社会环境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否则很难看懂。

鲁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后来的事。这些条件促进了他的转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对他的批判，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他不是轻易地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是蒋介石的屠杀，血的事实教育了他，马克思主义教育了他，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教育了他，使他相信：“唯有无产者才有未来”，并为此奋斗终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几篇他自己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看一看，如《二心集》、《三闲集》的序言，还有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篇正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文章。这几年没有人提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都是讲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武装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分析，对论敌的批判，都面貌一新了。他不再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位，而是和无产者站在一起了，他的文章也就更加锋利了。你如果找到他同梁实秋教授的论战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已经不再一般地论述国民性了。因为有人说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家的走狗，梁极不满意，怒气冲冲地去查英文韦勃斯特大字典，得知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穷光蛋，就写文章嘲笑“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如何如何可笑，鲁迅就写了一篇批梁的文章，叫《资本家的“乏”走狗》，嘲笑这位大教授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只能算一条“乏”走狗！鲁迅这个论断极其准确，以至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反共分子的文章内容如此贫乏，就不由地想起这个题目。

人是分为阶级的，这是客观事实。只讲国民性，不讲阶级性，只能使自己难以正确分析事物，如同早期鲁迅那样。你看，《毛选》第一篇就是分析中国的阶级，不但承认阶级，而且做了具体分析。对一个阶级，又分析它的大、中、小，上、中、下，左、中、右，又分析它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等等。这种分析，在整个毛泽东著作中是贯彻始终的。讲实事求是，就要讲这个“实事”，“求”其中的“是”，毛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 90 年代，不是 30 年代。现在中国的国民性和 30 年代也不相同。你看到人们自私、麻木，这是事实，但人们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他还没有反斯大林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在当今中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大战”中，那些人可不麻木。在那些旁观者中，也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革命勇士。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国民性中包括着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阶级内部、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斗争。先进、中间、落后，总是存在的。不会都先进，也不会都落后，很可能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家原来有一张毛在天安门上谈话的照片，面对百万欢呼的群众，他仍然冷静地说：“左派能有百分之十就了不起了！”而希望就在这里。……

1996年12月12日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

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1998年9月20日

维维、毛弟，你们好。

……中国南北洪水都已经退去。百年一遇也吧〔罢〕，千年一遇也吧〔罢〕，总会退去的。它有季节性、局限性，总不能年复一年，也不能把长江的洪水倒流进青藏高原。

叶里钦、克林顿这两支〔只〕老虎遇到的麻烦就惨重多了。

想当年，叶里钦指挥坦克保卫“白宫”的时候，何等风光！全世界资产阶级都为他叫好。苏联人民几十年的奋斗成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被叶里钦代表的官僚、军阀、买办瓜分了，多个国家的资本涌入俄国，抢占市场。俄国劳动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深渊中。他们没有思想准备。赫鲁晓夫以来一直鼓吹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和平过度〔渡〕，却从来不讲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也不奇怪，他如果讲这些，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就不大好讲、不大好做了。经过这些年的演变，俄罗斯真是“翻天复〔覆〕地”。连末代沙皇也重葬沙皇村。双头鹰的沙俄国徽就立在新沙皇叶里钦的座位上。好像一切就绪，要庆祝胜利了。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情的，它并不服从叶里钦指挥。一次又一次地改组政府，不只是表现叶的流氓性，主要是反映俄国多阶级、多政治集团、多经济集团的力量消长。虽然报刊上也把俄国多个派别区分为左、中、右，实际这种区分并不准确，而且不断变动。比如说，普里马可夫，原来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被封为“左翼”；他是情报头子，同情伊拉克，又被封为“保守派”；现在他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总理，成了“中间派”，——你看，多

滑稽。所谓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人有左右臂、左右腿，军队布阵有左翼、右翼。有人否认左右倾，要大家不要再分左中右。真是大慈大悲，爱的世界。可惜，世界上没人听从他的教诲。叶里钦也不得不在左、中、右中求平衡。找一个所谓中派当总理、再加上俄共这样的左翼，“共度难关”。也许在短时间内，经过多派力量之间权力再分配，能够维持一个时期，但像当初得到 60% 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那种局面、那种气势不可能再现了。叶里钦不是年老多病，而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斗争的中心。叶里钦已经从一支 [只] 吃掉俄国千百万人民的真老虎变成疲劳不堪的病老虎。不过，还要当心，他还会吃人。

美国决定今天公布克林顿的详细材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本来是小事一桩，竟自搞成这个样子，克林顿绝不会想到。他的幕僚们也只能怪自己出谋划策不高明了。不论结局如何，都是一大好事。这件事，不只是给克林顿抹黑，也使一切关心世界命运的人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资本主义不是天堂吗？美国不是世界的天堂吗？不是美国在领导世界潮流吗？世界上那么多事，他们怎么不管呢？富国帮穷国，富人帮穷人，他们怎么不帮呢？花几千万美元调查一件丑闻，值得吗？——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提出来了，答案也各有不同。我所以说是好事，就在于它让人们动动脑筋。

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世界。至今还看不出头绪。

美、苏的波动也是它的反应 [映] 。去年今日人们还在那里谈论美好亚太世纪、跨世纪、新世纪，甚至要安排“新的千年”，好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千年！最近，这种高论似乎市场缩小了，不大听得到了。我很奇怪，那些喜欢高谈的学者休养生息去了吗？为什么不给我们谈一谈资本主义的危机呢？为什么成千亿美元今天流向东南亚，明天又改向拉美，他们怎么只往赚钱的地方流，不向需要的地方流呢？这种自由就是你们称颂的自由经济吗？为什么美国华尔街只反对计划经济、不反对自由经济？诸如此类，人们不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伟大的学校，人们会从实践中认识真理。……

1998 年 10 月 20 日

维维，你好。

……说起《新民晚报》，我这里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看到。因为有几个版，总有一两条可看的。1957 年大鸣大放，赵超构放的是报纸要“软些、软些、再软些！”他要的办报自由，就是如此。看看最近这些天的《新民晚报》，应当承认，确实接近赵超构的方针了，和港台报纸有些相似了。赵公九泉之下应当开心了。

不过，这“软些”也只是说说而已。鸡毛蒜皮，街头巷尾，狗咬人、人咬狗，闹闹轰轰，就算“软”了吗？不说政治新闻，就拿人们称作“报屁股”的副刊来说，确有一些软的，更多的却是软中带硬，或者干脆就是硬梆梆的长文章。比方，这几天登的《金融大风暴》、《世界核风云》之类，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硬问题。

在那些似软不软的作品中，也有耐人思索的。比如，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季羨林的，就写过这种文章。这位作者不是自封的“著名学者”，我青年时期就读过他的作品。后来，他到了印度，解放后才回国，成了印度文化艺术的专家。我想，他如果向我们讲解梵文、佛经，一定很内行，虽然印度文化很复杂，他也不一定能讲得好。没想到，头几天读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却是讲的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开国皇帝，全凭厚、黑、大三个字得天下。厚，就是脸皮厚；黑，就是心黑；大，就是胆子大。他举秦始皇、刘邦为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作品竟自出于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如果这样来分析历史人物，都可以称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太容易当了。

说来凑巧，正当我解不开季老先生的谜的时候，《新民晚报》又说“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又有新作在北京首映，内容是荆轲刺秦王。电影导演分几代，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位先生的作品我一部也没看过。奇怪的是，这部作品，据记者报导说，全部角色都是丑角，许多观众不解。我也不解。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被司马迁的描写震动过。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至今仍被人吟咏。我不赞成荆轲，因为这种个人冒险即便杀了秦王，也解除不了燕国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这类行动。但是，把秦王、荆轲都描写成傻瓜，就莫明其妙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荆轲在当时的燕国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秦王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决定的。那些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了皇帝，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杀起农民来，决不手软。所谓施仁政，也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蒋介石就说“剿匪就是施仁政。”杀红军，就是对地主阶级施仁政，就是对日本侵略者施仁政。蒋介石不愧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西方资产阶级也在反暴力，但是，他们只反对革命人民的暴力，从来不反对用暴力镇压革命。你看，北约部队在南斯拉夫面前耀武扬威多么神气，他们却说这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我不愿对这一老一少两位著名人物发表评论，也不值得评论。只是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有的连口头上也不说。在软些、再软些中，发表不软的东西，也许是辩证法的最新发展吧？……

1998年12月20日

维维，你好。

……一到岁尾，大家都要谈谈回顾、瞻望之类。不过，这几天被美国人搅得乱糟糟的，听上去，很像进了集贸市场，各喊各的，“多极世界”。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里钦，他比较鲜明。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里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都说要从荷兰革命开始，但真正有影响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影响特别深远，《马赛曲》至今还为许多革命群众传唱。这几场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不同之处是，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反对国王和贵族、教会，人民群众参加了，却没有得到利益，特别是农民没有得到土地。

美国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得到利益的却是大封建主，印第安人、黑人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场革命的总司令华盛顿就是属于革命右翼的大农场主，属左翼的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宣布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但是他不反对奴隶制，他家里就有许多奴隶。法国不但出现了许多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纲领，在人民中长期宣传，比较深入人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同贵族、而是同人民群众结盟，人民群众参加的越来越多，革命高潮越来越高，革命的领袖一批又一批地被更换，新的领袖越来越激进，在他们的进攻下，国王东躲西藏，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我们都看过这方面的电影、小说，至今仍然感动人。人民群众不但直接参加斗争，而且得到了实际利益，主要是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但英、美革命都没有解决，只有法国大革命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革命到了高潮，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看到人民群众要继续前进，就害怕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果实，得到了政权，得到了财富，废除了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就不想再前进了。人民要前进，就同资产阶级发生矛盾。法国大革命的左翼领导者马拉、丹顿、罗伯斯皮尔和那个喊出“在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平等是空话”这样的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口号的人，都被暗杀或上了断头台。在“热月党”执政以后，革命也就终结了。革命热潮中互相称呼“公民”，这时又恢复了老称呼“先生”。以后就是“拿破仑”上台、复辟、反复辟。我想，法国革命内容极其丰富，几乎可以说是以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更值得重视。他们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有力量；当群众的利益同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立刻转过来压迫群众，这几乎是普遍规律。在当今世界，人民群众的要求往往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怎么还能领导群众革命呢？革命一旦涉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

转过来和敌人合作，反对昨天的同盟者。各国资产阶级没有不这样做的。他们已经不能领导了，他们已经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叶里钦说得对：“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前面要加“资产阶级”这个词。

无产阶级却不同。马克思说得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索[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会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资产阶级的本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独立地领导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从但丁写《神曲》算起，用几百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解决。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叶里钦说错了。

最近，我还在读《世界通史》，越看越清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没有哪一位上帝能够叫它向后转。一时的挫折，不过是前进过程中短暂的休息。资产阶级的嘟嘟囔囔，只会使人们厌烦。

不知道这几天还能看到什么新闻。不过，已经够热闹的了。巴格达的炮火也许能够给斋月、给圣诞节增加一点新鲜感，人们会问：这些导弹明天会不会飞过自己的上空呢？新世纪就要这样开始吗？

这几年，每年新年总要写几句，都是老话，没有新意，不过借此祝愿你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同人民同步前进！

1999年1月20日

维维，你好。

真是“开门大吉”，1999年不请自到，进入廿世纪最后一年了。

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一位世界霸主克林顿正在美国宣读他的《国情咨文》，据说有许多新语言，用来吹散弹劾造成的阴影，而下午他的律师们要连续进行24小时的辩护。另一位霸不起来了的霸主叶里钦又住进了医院。据说这是他近年来第十五次住院了。

两件事都有两重性，对他们，是不幸；对人民，可以擦亮眼睛。资产阶级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越来越腐朽。在美国，上次弹劾约翰逊，还是为了如何对付南方奴隶主，这属于政治纲领、路线、方针之争，这次却是为莱文斯基事件，弄得全国乌烟瘴气。资产阶级的聪明才智就是这些了吗？叶里钦那里的事，也证明，气势汹汹地篡夺了苏联劳动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批蠢货。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

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连这个双手沾满苏联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精疲力竭了。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会发疯。但是，谁也挽救不了他们的灭亡。美、俄之外，英、法、德、意、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说他们日子很好过。

同上个世纪末相比，就可以看出：那时资本主义已经把全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各个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正在准备世界大战。

不论怎么说，他们还有点劲头，你死我活，拼个输赢。现在却为如何统治这个地球一筹莫展。

有趣的是，克、叶在两国政治生活中都是所谓左翼。欧洲联盟十三国中有九国属于左派党执政。英国是“新工党”，意大利是原来的意共改组的“左派民主党”，法国、瑞典等国则是社会民主党。——这不是实现了“和平过渡”，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吗？第二国际和赫鲁晓夫的纲领变成现实了？许多理论家对此有多种说法，甚至用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如何错误，资产阶级如何调整结构，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云云。我以为，只要在这些左派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了。他们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属左翼，打着“民主”一类旗帜，比如克林顿就经常说他的党代表工人、青年、妇女、黑人，也经常搞一点有利于这些人的政策，美国最大的两个工会劳联、产联都支持民主党，克林顿到现在仍有 60 以上的支持率，倒也证明他们的欺骗有些效果。但是，他们的真面目总会暴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能搞一点社会改良，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们也无法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在俄国，叶里钦像玩走马灯一样更换总理，都解决不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从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组织似乎比右派能拢 [笼] 络人、欺骗人，但是，他们总归骗不了多久。欧美各国，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党也看不到。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于 1905 年，谁能想到，1911 年就暴 [爆] 发了辛亥革命？1898 年中国还是义和团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刚成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出现呢，20 世纪初，中、俄两国的革命就暴 [爆] 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世界通史》最后有一个“大事年表”，从中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重大事件，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把它拿来和眼前的事态对照一下，特别启发人的思想。一百年，弹指一挥间，谁敢说世纪之初不又是一个革命高潮呢？

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工人领袖曾经沉痛地说：我们破坏了一个旧社会，却没有得到一个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现在该我们工人阶级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说的，真了不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试验，21 世纪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连续剧上演！——这就是我在 1999 年之初的祝愿。

1999年2月27日

维维，你好。

毛弟一家回沪已经六天。对我来说，从那天起今年的春节也就结束了。虽然每天仍能听到爆竹声，人们还在等着过元宵。

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外孙都成人了，女婿都要做爷爷了，才头一次见到，能说这不是一大特色吗？不过，我不敢说，只有我们家，别人家就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你和毛弟做的饭菜，各有特色，是我多年没吃过的。我已经记不得我们哪一年在一起过春节了，好像那是三十多年以前了。那时候过节，别有一番滋味，就连康平路的团拜，也只有清茶一杯，花生一把，糖果几粒，也不烧香，也不祭祖，不像现在这样，连电视屏幕上也是“福星高照”“财源茂盛”一类“传统文化”。“辞旧迎新”在那时是真的，扬弃旧传统，创造新文化。每年春节都有新感觉。

最近听到的新闻，大半都是美帝攻势逼人。兵家最忌四面出击，美国人似乎明知故犯，国内国外一起进攻。国内，克林顿案刚结束，各种争吵一起来。国外，五大洲没有一个平静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事件，美国都插手。安理会通不过，就挥舞“北约”这根大棒，谁不听话就挨一棒。不过事情并不如美国之意。也有几个“恐怖分子”不听他的话。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妥协。我以为，还是真的打一打为好。我不反对对话。因为对话情节曲折，有戏看。中国历史上，项羽、刘邦的“鸿门宴”，秦王、赵王的“渑池会”，不是很精彩吗？但是，打和谈都不是孤立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战场得到的谈判桌上也不至丢掉。对伊拉克多年喊打，而且真打了，美国的本领也就完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宣而战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对南斯拉夫，从铁托时期起，先是支持铁托反苏，使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以来，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六个共和国都“独立”了，剩下一个塞尔维亚，仍然不放手，又挑起科索沃争端，非把整个巴尔干置于“北约”即美国手中不可。我看，总免不了一战，除非南斯拉夫投降，当美国“战略伙伴”，在美国的坦克保护下，吃美国面包，做新式的文明的亡国奴。我看，这做不到。巴尔干多个民族争得民族独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会轻易放弃吗？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也不会放弃。不到亡国的危险，人们不会轻易拿起武器。美国几次想动武，终于没动，根本原因，我看，美国怕打出一个革命的南斯拉夫，打出一个革命的巴尔干。“不战而胜”一尼克松的口号，仍然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

《世界通史》我看完了。150万字。文字水平不高，很多章节写得枯燥乏味。比起《史记》来，差多了。司马迁写得十分生动，许多历史人物、事件，跃然纸上。这本书自然比不上。但是，它毕竟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叙述历史的，反映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成果。有些章节，如奴隶起义，欧洲封建制的形成到衰亡，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

写得还比较生动、简洁，不难读。读完以后，再复读一遍，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有比较具体的了解。

这本书，头些年翻过，这次算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读过了一遍，好像还了一笔债，心里很痛快。我想读而没读成的书还有很多。只要眼睛能负担得起，还准备再读一些，还些书债。

现在读一些文章，觉得很可笑。有些人好像他就是历史，他可以随意解释历史，肯定、否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头几天，有一位自称是著名作家的人，就自称“三十年，我没变！”好家伙！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多着呢，比如曾国藩，这个屠杀太平军的屠夫，近来名声甚佳，有些人又吹捧起他来，说不定哪一天，他从棺材里站出来，说“我一百年没变”，依然是镇压太平军的英雄！其实，历来就有两个曾国藩，一个屠夫，一个英雄，看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讲吧。读《世界通史》，可以使看清世界发展的趋势，这是客观存在的，倒退说不成进步，进步说不成倒退。这个规律，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没有改变。

1999年3月28日

维维：

你好！又到月底，该写信了。

你们来的时候，忘记告诉一件事：这个月，我把《论语》通读了一遍。

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孔夫子是山东人。有人说山东最光荣，文武两圣都是山东人。但是孙子的名声却远远赶不上孔子。大城小城都有孔庙。那时没提创建精神文明的口号，也没有规定往路上丢纸头要罚款，但是，人们都知道要把字纸丢进写着“敬惜字纸”筐子里，以示对孔圣人的尊敬。整个统治阶级，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没有不尊孔的。我虽然没在学校里读过《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的话却是知道的。但是，孔圣人说的“学”指的是什么？是天文、地理，还是 $x+y$ ，就从来没有想过。鲁迅说，那些提倡尊孔读经的人，很少有人真正读过经的。据说真正读过十三经的，只有章太炎一人。我是十三经一经也没读过，这倒不算什么错误，但是，却跟着别人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即便我没有把这类圣人遗训挂在嘴上，总不免是一个缺点。

我这次读的《论语》，是北京大学哲学系72级工农兵合写“批注”本。这大概是孔学问世以来，第一本工农兵的批注本。以前都是属于学者群体的人批注。于今工农兵来批了。我很佩服这些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没有学究气，也不像一般的书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出的工人、农民、战士，充满了革命的朝气，在这位被封为“至圣先师”面前，无所畏惧。更可贵的是，

他们的批注是动了脑筋的，工作做得比较细。比如，对《学而》的“学”，《批注》说，主要是指学习西周奴隶时代的《礼》、《乐》、《诗》、《书》等典籍。——这样，就具体地分析了孔子教的是什麼，学生学的是什麼，他的教育目的，就不是培养抽象的“人”，而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人。“人”在那时不包括奴隶，奴隶不是人。同样“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三人也只能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人。——诸如此类批注，我认为是批得好的。他们把那些杂乱无章、枯燥无味的说教“批注”活了，活像一个孔老二在讲话，一个现代人替他当翻译。这些工农兵学员，吸引着我不觉疲倦地读完了《论语》。——不是孔老二“悔[悔]人不倦”，而是工农兵学员诲人不倦，真该谢谢他们。

读完《论语》，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易。孔是以“克己复礼”维护奴隶制为目标的，秦始皇要革奴隶制的命，以为可以一烧了之，但是，秦始皇是早死了，如果不死，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说不定他也要尊孔的。因为奴隶制、封建制都是私有制，都要处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孔老二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夏商周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即“周礼”，这对封建主也是“有用”的，甚至对于东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还在用儒生的帽子撒尿，到了武帝就尊孔了，而且竭力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需要，增加了许多“包装”，增加了欺骗性。以至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孔夫子的声音。北京大学这些学生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任重道远。我想，总会有人来继续努力吧。

读完这本批注，我就想继续读赵纪彬教授的《论语初[新]探》，也许这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进一步了解中国思想通史，使自己的头脑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1999年4月24日

维维，你好。

.……头几天，在《东方时空》偶然看到记者采访金庸的报导。

《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的主题是“浓缩人生精华”，以宣传“社会精英”为唯一目的。这回是宣传金大侠，祝贺他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访问者对大侠崇拜的五体投地，金大侠春风得意，满面笑容，谈得很投机。

以前，我只知道金是写武侠小说的。后来，见《人民日报》的某篇文章，把金放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排行第二的位置，仅次于鲁迅而高于茅盾、巴金、老舍。这倒新鲜。有这么一位大作家，我怎么不知道呢？香港报刊我经常看到，好像也不曾见过他的大作。后来，从广播里听了一遍他的《笑傲江湖》。

同历代的武侠小说比，似乎有一点新东西。也和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不同。金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刻画〔刻画〕，但写的又是江湖侠客，不是张天翼的流氓兵痞。他的语言也不是程式语言。他的令狐冲也不属于七侠五义中的古代人物，是 20 世纪的“大侠”。这些，我想，这是金庸优于他的前辈的地方，武侠小说本来就流行，他的新武侠受到读者欢迎，那也不是怪了。不过，出于我的习惯，对他的作品也有疑问。《笑傲江湖》究竟是说的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问题？他似乎崇拜佛教，又很尊崇道教，又喜欢一群行侠仗义的丐帮？特别是他着力刻（画）了魔教，又似乎主张正魔两教和平共处，“人狼共舞”，他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么混乱不堪？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美国人所提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是古代英国、现代美国的混合型知识分子。一因为我当时确是边听广播边想过，所以还记得一点，不过除令狐冲以外，多数主人翁都记不得了。

这次记者的访问，得知：金庸信仰佛教，他不但写小说，还是政论家，香港《明报》的老板兼评论员。他对国内时政作过多种“预测”。包括中共中央的人事，如“毛死后江要倒霉”，“因为大家反对毛的文革政策，希望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一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得意。好像当今中国的诸葛亮就是这位金大侠。如此说来，他的众多侠客的政治含义就不难了解了。他崇拜的人物，就是令狐冲（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角色）那样的能够又爱正教又爱魔教，又爱道教又爱佛教、多个教派都要他，而他却“笑傲江湖”去了。他没有说令狐冲平定天下之后，多个教派怎么样了，恐怕也难说。他还没有“预测”到他要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当院长。据他说，他到浙大，不要工资。他和学生间，他是大师兄，学生们是师弟师妹——那一天，听到这句话，我笑出声来了：真没想到，中国会有一座这样互相称呼的大学，校园里一片师兄师弟声，向大师兄参拜，岂不热闹！继而一想，师兄、师弟之外，师父是谁呢？太师又是谁呢？金庸怎么忘记了师父？

他并没有忘记。他说他的作品，想从人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影响国民的精神。他说鲁迅的《阿 Q 正传》讽刺“精神胜利法”，他想影响国民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我没有看过金庸的全部作品，无从评论，是否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无法和鲁迅比。鲁迅，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为革命的。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提出的口号是“推翻这吃人的宴席！”他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勇往直前，从未动摇。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是〔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今天，他被吹捧到“大师兄”的地位，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社会气候，使他像一支〔只〕热气球飘飘向上，换一换气候，他就会落到他应当去的地方。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任何大侠都改变不了这种发展趋势。

五一节到了，斯大林在一张传单中写道：每个阶级都有它的节日。工人阶级的节日五一是一是群花盛开的春天。它象征着工人阶级的未来。向你祝贺节日！祝全家在五一节愉快！

1999年5月16日

维维，你好。

……上次信上，曾说，我要开始读赵纪彬写的《论语初[新]探》。现在，已经读完了。要问我的感想，我的回答是：孔夫子非批不可，把孔老二批倒也不易。

孔夫子影响深远，并不是他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学问没人超过，适应千秋万代。但是，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如何处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奴隶主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如何巩固衰落的奴隶制，是做了不少工作。他的思想是唯心论，不适应当时新起来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需要，所以到处宣传，也没有多少销路。但是随着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汉武帝开始感觉到孔夫子这一套对封建主很有用处，因为都是剥削阶级，改造起来也不太难。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封建社会从兴盛，直到它的末期，孔夫子的声望越来越高，总是革新派反对的对象，总是保守势力的工具。到了近代，这种斗争仍在继续。8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进入斗争高潮。批孔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最近，我读到几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多半肯定批孔的必要性，但更多地放在当时批孔“过头”方面。

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说到当前批孔的必要性。许多人谈话，倒说要崇拜孔夫子，攻击五四的批孔，应当如何继承孔夫子，似乎孔老二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我说批孔不易，就是孔老二的话蒙蔽了许多人。本来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许多人认为他是为全民服务的。“仁者爱人”被不少哲学家解释为：人就是一切人，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为了弄清一点，赵纪彬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指出：“人”和“民”在《论语》中是两个概念，人是奴隶主阶级，民是奴隶。《论语》只讲“使民”，没有一处讲“爱民”。“有教无类”也是很多人吹捧孔夫子的一条，赵纪彬证明：这个“类”是指示“族类”，因为奴隶主拥有不同族类的贵族，每个族类内部仍然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教育一切人，不分阶级。还有一些学术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赵纪彬都作了剖析。全书三十二万字，引经据典，读起来很吃力。

我想，工农兵那种《论语批判》，劈劈叭叭，有用。还需要加上赵纪彬这种细致的批判。还需要在以上基础上写出通俗易懂的读物，把马克思主义对孔子的观点，普及到群众中去。这，谈何容易呵。

赵著也有缺点，不通俗。限于学术界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用。没有广大群众参加和接受，也难以收效。赵从1944年教授《论语》，到1975年《新探》出版，花了三十年时间。我想，总要有人继续做下去。总不至于一千年以后还是孔夫子王国吧。

多年来，人们总是感到沉闷，连五一节也没劲。但是，人们又相信：矛盾在，总会对抗起来的。美国人的导弹在南斯拉夫炸了那么多天，似乎是别

人的事。炸苏丹、炸阿富汗，更是当做耳边风，谁也不想来抗议。满脑子装满美国是天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这次好了。像许多人说的，炸的清醒了一些。炸弹的轰鸣使许多鼓吹美国的人暂时闭上了嘴。但是，也有被炸弹吓昏了的，美国武器如何精，科学技术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可以不出兵就胜敌国，等等。唯武器论又起来了。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没有地面部队占领，一切轰炸都不能灭敌国。伊拉克证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又证明这一点。地面部队是决定性的，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性的，这些观点并未过时。我想，事实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克林顿也好，叶里钦也好，都没有本领改变这一规律。南斯拉夫的真正困难，是缺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是抵抗外敌的旗帜，但是难以持久。因为民族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不能消灭阶级矛盾，在民族斗争中仍然包括着阶级斗争。铁托的民族主义，在他死后不久就瓦解了。现在的领导，连“共产主义联盟”这样的党名都不敢坚持。艰苦的反帝斗争，难道能坚持吗？但愿战争创造出一个新共产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一口气写了这么一大堆，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谈谈家常而已。

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了。愿那一次解放的精神鼓舞人们前进。祝你和上海的亲人健康、愉快。

1999年6月20日

维维，你好。

……最近，我正读美国人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我总觉得，有一些著作，有机会应该读一读，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等。不知道这些，听别人胡说，就难免上当。

《古代社会》也属于这一种。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古代社会的变化。他甚至参加了一个印地安部落，得以详细地了解部落生活的真实情况。从大量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认为人类从血族制，进到氏族，再进到部落、部落联盟，是必然的。虽然晚于马克思四十年，但是独立地从事研究，他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同马克思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马曾经把这本书作了详细摘要。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写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了解古代社会，就不能不读这两本书。可惜，过去要读的太多，摩尔根的书翻了一翻，没有读完。这次整理书箱，发现书还在，就读起来了。

因为是科学著作，作者又是一位认真钻研问题的人，书写得有些枯燥，不像欧美电影中把印地安人写得那么野蛮、那么神奇，所以读起来很枯燥。比如，他采用一种方法，研究人们的称谓（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上下五代、九代），从这些称谓的相同、不同，分别出它们是怎样演化的，哪一

种是母系社会，哪一种是父系社会。他详细分析了不同的继承制，认定从公有到私有不同的发展阶级。搞清楚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变化的，打破了关于古代社会的种种说法，上帝创造世界、英雄创造世界，彻底破产。

有两点印象深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都必须下苦功夫。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四十年。上次提到赵纪彬写《论语新探》也是三十年，摩尔根又是几十年。他说，如果西班牙人初到美洲就研究这个问题就好了，那时古代社会的多种材料还活生生地存在着。现在已经不易找到了。他的想法不错，那时欧洲人正在掠夺印地安人，哪里会关心什么古代社会呢。

再一点，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不然的话，不会在各个大陆都是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连出现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总是前一种形态的内部矛盾为转变成后一种形态准备条件。现在，资本主义不也在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吗？既然原始公社产生了私有制，为什么私有制不能产生公有制呢？

说来有趣，克林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式武器，不只是炸坏了南斯拉夫的建筑物，也炸掉了多国人民的许多幻想。弄得全世界资产阶级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在这以前，他们还编出了一套理论，虽属欺骗，还能骗人。现在，困难了。如果把克林顿、叶里钦这两位世界大资产阶级代表最近三个月的言论集中起来，就不难发现，什么北约和俄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呀，似乎可以联合起来主宰世界，世界一体化的呼声传遍全球，似乎多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在话下了，全世界进入无矛盾的天国了。南斯拉夫危机的暴[爆]发，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打了他们的耳光。虽然他们还会耍新枪，也不大得心应手了。

我不想低估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全世（界）他们还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多国社会党仍然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效力。所谓北约，一多半国家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次没有一个社会党投票反对侵略南斯拉夫。相反，比起社会党[保守党]跟美国还要紧，比如，英国工党，这种所谓左翼党，比保守党一点不差。去年大选，许多国家社会党上台，有人表示欢迎。我看，这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要换马，另方面说明人民群众还有幻想。最近，欧洲议会选举，社会党的票减少，从第一大党变为第二大党。印尼的选举，苏哈托也失利。选举不能解决无产阶级政权问题。但是，他（它）可以教育人民，擦亮眼睛。总有一天，他们会比巴黎公社、彼得堡先烈们做得更好些，真正自己解放自己。每天看到南斯拉夫挨炸，心情很沉重；每天又看到帝国主义丢丑，看到叶立钦出洋相，心里又高兴。这就是我最近的心情。……

1999年7月17日

维维，你好。

……昨天中央电视用了那么长的篇幅介绍印尼大选，特别是对苏瓦拉蒂，对印尼的局势多年来头一次加以赞颂。在以前的信里，我多次提到过印尼。去年苏哈托下台以后，我曾想，现在流行孤儿寡母竞选。许多太太、太子、太女当选总统、总理。印尼抬出苏瓦拉蒂并不新鲜，她取得胜利也不新鲜。问题是印尼的人民能得到什么？

七月一日那天，我读完了旧书堆里找出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五个文件》。就是苏哈托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苏加诺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于 1966 年通过的。其中，主要是印尼共中央的自我批评，指出印尼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印尼资产阶级。我不知道，这种自我批评在国内白色恐怖下，怎样进行的。是在艾地和政治局成员被杀以前，还是以后，又怎样传到国外。我认为，艾地死后，印尼共对外联系中断了。但是，不管怎样，千百万人头落地，毕竟惊醒了印尼共产党人。在三十年过去、苏哈托垮台以后重读这些文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是有喜有忧。以反革命武装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政权，靠着本国右翼势力即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靠着国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实行法西斯专政，把印尼共和一切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据说，到苏哈托倒台前，仍有上百万人的身份证上印着“亲共”之类的标志，处处受监视。虽然有人鼓吹苏哈托依靠全国稳定，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其实，没有印尼共政治局成员全部被杀，没有法西斯专政，他是巩固不了政权的。所谓经济繁荣不过是官僚资本的繁荣。苏哈托从一个师长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贫苦的工人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正因为苏哈托是如此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统治阶级分裂，他也不得不“下岗”，把政权交给他的接班人。

现在，苏瓦拉蒂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却并未获得多数。即使苏加诺小姐当了总统，局势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不是人民革命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情绪改变统治策略。军队仍然在反动派手里。我说的忧，还不是指这些。我忧的是至今看不到印尼共的影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仍然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

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不是不要统一战线，而是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第一次中国革命失败，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把革命交给蒋介石汪精卫。抗日战争又合作了，王明梳装[妆]打扮跑到武汉，甘愿当蒋介石的鸦头[丫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服从蒋介石。要不是纠正得快，那就不是丧失新四军军部和几千人马，连八路军也要保不住。许多人以穿国民党的军服为荣，连名片都印上国民党的军衔，红军一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不是光荣称号了。印尼共的文件，对类似陈独秀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我不相信印尼共被斩尽杀绝了。为什么没有打出旗号？就算党组织在地下活动，也不会没有公开工作呀。难道说，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都没有真正取得教训吗？

人们认识真理，往往多次反复。这部分人认识了，不等于大家都识（认）识了。毛泽东的《怎样分析阶级》和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资产阶级》同时并存。所以，我也不必杞人忧天，印尼共产党人总会找到出路的。毕竟是苏哈托垮了，印尼人民有可能取得较多的自由。

《古代社会》我也读完了。古往今来，总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1999年10月16日

维维，你好。

……不知道你是否看到，《新民晚报》登了一条短新闻，说是英国 BBC 在网民中进行测验，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这和林彪说的一千年才出一个差不多。没想到，回答的头一名（“首席”）竟是卡尔·马克思。可惜太短，没有说明是哪些人投票，理由是什么。我希望能从《人民日报》上读到详细报道，可惜，至今没有看到。

我所以对这条新闻有兴趣，首先就是：它是 BBC 发布的，而 BBC 是老牌反共机构。如果是一个共产主义机构发布，哪[那]倒没有什么吸引人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猖狂地天天叫嚷“马克思主义灭亡了”的时候，这个老牌反共机构为什么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呢？

其次，它列举的投票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些人也推举马克思呢？

我觉得，这多少反映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走头[投]无路，寻找光明的心情。找来找去，似乎马克思比别的思想家讲的道理要切合实际一些。

头几年，那位于今定居美国的许家屯，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山沟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到了香港、美国一看，才发现原来资本主义“还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还是跪倒在资本主义面前，三呼万岁，讨碗饭吃吧。可惜，许家屯跪了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证明他的论断。相反，危机不断暴发[爆发]。东南亚的一场危机，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设立了很多“知[智]囊团”、“思想库”，却开不出灵丹妙药来。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难最深的是工人阶级。欧洲，这个老牌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找到了裁减工人的手段，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成千万的工人失业，靠救济金生活。

资本家算盘是清楚的，发一点救济费，比多用工人赚取的剩余价值要划算得多。资本家采取多种手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觉得社会

民主党、工党似乎是为工人谋利益的。欧洲联盟 15 国有十国是社会党执政，就说明老牌资产阶级政党不灵，换一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欺骗性有多大。不过，最近又有变化，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接连失利，说明工人和劳动者的眼睛亮了一点。法国共产党最近号召游行，一向跟着法共走的法国总工会宣布拒绝参加，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表现。也许是这些条件，使人们又找到马克思了。

不过，欧美工人阶级可能继续受骗。欧美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头几年报上有介绍，说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同于“东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研究成果也有可取之处。我不相信有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了西方，也研究了东方。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球性质的。由此，我想，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也许正是要把马克思变成“西方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一考茨基时，就曾指出，他们是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BBC 所以这样积极，恐怕用意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只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可以摘几句话欺骗人，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所以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只是想用伪马克思主义骗人罢了。它们是不能实行的。头几年，有人说马克思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实行“个人所有制”即私有制，不久就被拆穿了。BBC 想干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因为它发布首席思想家，吸引工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那就不是他们的愿望了。

2000 年 4 月 22 日

维维，你好，大家好。

……每天看电视，都可以看到一段皇帝推销面食的广告。“做皇帝要做好皇帝，吃面要吃好面。”开始，觉得很好笑：皇帝做起推销员来了。继而又想，这也不奇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欧洲的国王们也做广告，包括剪彩仪式之类。不过，那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中国皇帝，包括那位末代皇帝都早死光了，怎么要他们来兼任推销员呢？

现在宣传人民生活改善的材料，不可少的一条是家里装了电视机。我想中国皇帝可没有一个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无电视可看，也不能七[去]做电视广告。

现在电视里皇帝的戏真多。每天打开电视机，很难得看不见皇帝。也不知那[哪]一位是好皇帝，或者坏皇帝。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满嘴里自由、民主、平等、仁爱。艺术家有创作自由，皇帝、神仙、花鸟鱼虫都可以为艺术家所用。但是真名实姓的，所作所为总不能离真

实人物太远。要奴隶主大讲民主，总叫人好笑。那时也讲民主，那就是奴隶主们的民主，他们绝不会给奴隶们民主。秦始皇的民主也只给封建主，绝不给农民。奴隶主捉了俘虏不杀，叫他做奴隶，就属于历史的进步了，要他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同样，资产阶级实行雇佣制，就比封建制进步。解决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将来没有专政了，也就没有民主了。……

2001 年 12 月 31 日

亲爱的大女儿：

欣逢你五十五岁生日，我们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家！

55 年不算短，也不算长。希望你下一个 55 年，过得更有意思，更快乐。

这个月，看《康熙》，总要听到那一句“真想再活五百年”，莫明其妙。什么意思呢？康熙爷真活五百年，我们还要向这位皇上下跪，真是荒唐！不过，也难怪。当今世界，想让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再活五百年的，大有人在。“新千年”之说，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头几年，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资本主义找到了“自我完善”的方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要灭亡的论断错了。事实是不骗人的。四架飞机在“9·11”撞了一下，这类神话就难以出口了。世界经济停滞不前。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格林斯潘也傻眼了。阿根廷政治、经济，一片混乱。在法国，连宪兵都罢工了，这也算新世纪的一景吧。当然，资产阶级能找到办法收拾局面的，资本主义不会马上垮台。但是，资本主义从 16 世纪算起确实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它大概也想再活五百年，来个新千年。不过，我想，他们的命运恐怕不会比康熙爷好，也许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就会被社会主义代替。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这些话，现在不太有人讲了，我还是想讲给女儿听，当作 2002 年的生日礼物。愿你珍惜这份礼物。……